

文史考辨

人物

翁同龢:两代帝师 同光清流

□王顺成

翁同龢字声甫(一作笙甫),号叔平,又号韵斋,因常自悔失言,不能守口如瓶,故晚号瓶生,署瓶庐,亦曰瓶斋居士;又因得松禅旧印而自署松禅老人,另有一说:翁同龢罢官归隐于白(鹤)鸽峰萧寺,寺为万松寺故址,故自号松禅。

翁同龢于1830年5月19日,出生在京城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,是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,四岁时随祖母、母亲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。

1856年,翁同龢高中状元,官刑部、工部、户部尚书,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,协办大学士,是当时清流南派领袖。在任刑部尚书时,他秉公执法,明察暗访,使“杨乃武与小白菜”重大冤案得以昭雪。

常熟翁氏家族,世为官宦,素有“一双宰相,两辈帝师,三位公卿,四代翰林,五人进士,代有高才”的赞誉。

翁同龢常以帝师的特殊身份,以忧民勤政开导皇帝。曾直谏:“宜停不急之工,惜无名之费,开直臣忠谏之路,杜小人幸进之门。”同治皇帝览奏动容,决定停止修复圆明园的工程,并有“停工程,罢浮费,求直言”之谕旨。

清政府曾向外借了笔巨款,经办人给翁同龢送来一笔回扣,他坚拒后将此事奏明了光绪皇帝,光绪大怒,下令严查私分这笔回扣的官员。

维新变法中,翁同龢被革职还乡。在故里,翁同龢每天要到衙门签到,接受地方官的管束。翁同龢为官清廉,罢官回乡后,生活十分困窘。翁同龢的门生对老师的困境十分不忍,集资后,托孙雄给翁同龢送去,却又被孙吞没了。

翁同龢无奈,只得典当,出让一些古玩、字画度日。有句云:“篋中图画都捐尽,卖到长江万里图。”盖《长江万里图》,为其秘笈中珍品。

翁同龢有自挽联:“朝闻道夕死可矣,今而后吾之免夫。”盖迭获严遣,有感而发。1904年,翁同龢去世,年七十五。当时挽者甚多,其中一联云:“悠悠苍天,咄咄怪事;昭昭青史,耿耿孤忠。”

(《北京晚报》)

史海钩沉

宋代豪华版“录取通知书”

□书芸

唐代以来,随着科举制度兴起,金榜题名成为很多读书人的入仕敲门砖,随之伴生了“录取通知书”——“泥金帖子”。

朝廷为了凸显对新科进士的重视,用金粉涂饰在笺筒上来通知新科进士,可谓给足了文人面子。生于晚唐的文学家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·泥金帖子》记载:“新进士才及第,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,用报登科之喜。”

到了宋朝,由于皇帝重视文教,教育部门精益求精,特意将“泥金帖子”进一步改良,特用“黄花笺”替代笺筒。“黄花笺”锦帛材质,金粉涂之,再写上新科进士名字,大气高贵,堪比皇帝诏书,因而被称为“金花帖子”。

宋人赵彦卫的《云麓漫钞》对“金花帖子”记录颇为详细:“国初,循唐制,进士登第者,主文以黄花笺,长五寸许,阔半之,书其姓名,花押其下,护以大帖。又书姓名于帖面,而谓之榜帖,当时称为金花帖子。”

史书记载,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两个月,突击性一次就录取了500多名进士,还亲自宴请这些“天子门生”,完全按照国宴标准举办;还每人发20万“装钱”,作为上任的差旅费、安家费,更让这些进士感恩涕零,誓死效忠陛下。难怪进士们会把“金花帖子”当圣旨一般供奉,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荣耀,彰显圣恩浩荡。明朝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卷四证实:“宋朝吴郡士登科者,始于龚识,其家居昆山黄姑,犹藏登第时金花榜帖,乃用涂金纸,阔三寸,长四寸许。”正是因其用料如此考究,宋代“金花帖子”也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古代豪华版“录取通知书”。

(《现代家庭报》)

名剧《西厢记》的改编与传承(上)

□刘连群



名剧《西厢记》演出场景(资料图)

《西厢记》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,七百多年来始终在舞台和民间流传,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。近代评家更把这部剧作与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古典文学名著并提,称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和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是“两座高峰”“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”。

在中国戏剧史上,《西厢记》同样曾被赞叹,明初贾仲明〔凌波仙〕吊曲称:“新杂剧,旧传奇,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。”

国外对《西厢记》的评价也很高,外国没有像我们民族戏曲艺术这样的熔歌唱、音乐、舞蹈、杂技、武术等于一炉,兼具唱、念、做、打的表演形式,一般习惯于和他们的歌剧相比较,俄国柯尔施主编、瓦西里耶夫著的《中国文学史纲要》中写道:“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相比较,即使在全欧洲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。”

《西厢记》得到中外人们的喜爱和推崇,首先和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分不开的。在婚姻被门第、财产、权势、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所辖制和支配的封建时代,通过“永老无别离,万古常完聚,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美好祝愿,破天荒地第一次正面提出了以“有情”作为缔结终身的基础,道出了历代心心相印的真情儿女们的心声。为此评家把“有情的”三字看做是概括《西厢记》全书的“眼目”,该剧的“戏眼”。它所表达的不是某一时期、某一阶层的内心呼唤,而是世世代代人的理想和愿望。联系古今中外的社会现实,这一追求很崇高,有时又很难,多少“有情”儿女的悲喜剧由此而生,一幕幕再现。但也正因为难,曲折多艰,所以格外珍贵。这是《西厢记》的主题思想高于前代和同时代婚恋作品的原因,即使是后来明、清两代的戏曲作品,也没有超过它的。

艺术方面,游国恩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认为《西厢记》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,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,完成了莺莺、张生、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,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展开高度结合,成功地表现了事件曲折复杂的过程。作者善于描摹景物,酝酿气氛,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,多数场次饶有诗情画意,形成作品独特的优美风格。《西厢记》的语言也引发了专门的研究。张庚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“剧诗”说,推崇《西厢记》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,确实,这部戏在语言的总体风格上,形成了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特色,使得全剧“珠玑满眼,美不胜收”。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写意,都有动人的妙语,如“长亭送别”一节: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”,情景交融,感人至深,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。

关于《西厢记》的作者,多年来众说纷纭,主要有王实甫、关汉卿或王作关续、关作王续,以及元代后期作家集体创作等多种说法,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实甫的著作权已为大多数人所承认,王名德信,字实甫,大都

(今北京)人,为元代前期作家,著有杂剧十种,包括《西厢记》《四丞相高会丽春堂》和《吕蒙正风雪破窑记》等。

《西厢记》的故事,最早不是见于戏剧,而是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《莺莺传》(一名《会真记》)。

在《莺莺传》中,男主角是个文过饰非的无行文人,反面人物,他骗取了莺莺的爱情,始乱终弃,另攀高门,小说写出了少女对爱情的纯真向往与追求,客观上也暴露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等黑暗现象。此后,故事广泛流传,产生了不少说唱其事的词曲,北宋赵德麟〔令〕写过〔商调蝶恋花〕鼓子词,可以歌唱,使故事从案头文学小说,延展成为弦索伴奏的演唱文学,促进了故事的传播。再到金宋之际,又出现了董解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,俗称《董西厢》,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,而以唱为主的文艺形式,故事立意、内容有了新的突破,把莺莺受张生引诱失身而终被遗弃,改为二人互相爱慕,为争取理想婚姻而向封建家长作斗争,终于取得圆满的结果。《董西厢》对《莺莺传》的改造、变更,为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杂剧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的基础,使作者得以发挥杰出的创作才能,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,创造性地把说唱莺莺的故事化作多人扮演的大戏搬上了舞台,问世以后,很快在大江南北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到了明代,“自王公贵人,逮闺秀里孺,世无不知有所谓《西厢记》者”。其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,其影响之深远,在戏曲史上很难找到第二部。

综合上述,《西厢记》不是某位作家一蹴而就的成果,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多年逐步演进的过程,从唐代的小说到宋代的鼓子词,再到金代的诸宫调《董西厢》,然后才是元代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经历了唐、宋、金、元四个朝代。

《西厢记》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,版本众多,不下百数十种,仅明刊本就有六十余种。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戏曲剧种演绎此剧,川剧、蒲剧、江淮剧、越剧等都有“西厢”剧目,楚剧有《三才子》,昆曲有《拷红》,滇剧曾有《莺莺别》,豫剧有《拷打红娘》,评剧有《崔莺莺》,河北梆子有《打红娘》等。在戏曲剧种对《西厢记》的争相演绎中,京剧早期像某些地方戏一样,没有正面搬演原剧的男、女主人公,而是选中以丫鬟红娘为主

角。1936年,荀慧生先生结合自身艺术风格,推出新戏《红娘》,他的说法是“用很少的几个人物,很清楚地交代出戏剧性很强的故事情节”,《红娘》随之成为荀派重要的代表剧目。

1959年,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,“大庆”排大戏,京剧界以最强阵容编演了两出名剧,一出是根据传统剧目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改编的《赤壁之战》,另一出就是古典名剧《西厢记》。两戏由当时的中国京剧院、北京京剧团联合推出最佳阵容,大师云集,群星荟萃,引起了热烈反响。

由著名戏剧家田汉执笔的《西厢记》,不同于《红娘》,而是保持原剧的故事、人物架构,正面表现崔莺莺、张生的爱情及婚姻历程,同时为了体现原作的文采,保留并丰富了许多典雅、精美的唱词,文学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演员由张君秋饰崔莺莺,叶盛兰饰张生,杜近芳饰红娘,这在当年的京剧兴盛时期,也堪称顶尖的阵容了。张君秋正处于艺术创作的高峰期,新剧迭出,张派声腔随之广为传唱。《西厢记》由于保留了原剧许多典雅华美的唱词,全剧多达七个辙口,比一般戏都多,编腔、演唱的难度很大,对演员的要求很高。张君秋天赐佳喉,又经过常年的艰辛努力,不仅可以胜任多种辙口的唱词,而且以过人的才华设计并演唱出传情达意的效果,力求完美地体现文本的创作意图,是极为难能可贵和深具艺术价值的。

当时,京剧《西厢记》成为剧坛关注的热点,但演出的场次并不多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《西厢记》不同于笔走偏锋、扬流派之长的《红娘》,而是保持元杂剧的剧情、人物架构,正面表现崔莺莺、张生的爱情和婚姻历程,这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,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学和艺术水平,但文本体制的转换由于多种因素,很难一蹴而就,好戏总是需要反复锤炼的。

后来,张君秋先生还想恢复这出戏,由于原剧时间过长,要四个多小时,把配角的戏减一些,剧情又有不顺之处,演过几场后就搁置下来。但他始终惦记这部名剧,晚年曾经拜托老领导、也是老朋友李瑞环同志对文本进行整理、加工。

实践证明,对这样一出名剧、大戏,只做做减法是不行的,必须有整体构思,通盘考虑,精心布局。

(《天津日报》)